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 【北疆印记】

清水河县位于呼和浩特市南端、黄河“几字弯”东北角拐弯处,黄河文化在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发展过程中,在清水河县留下了古遗址、古建筑、石刻文献、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资源。

当前,清水河县借助北疆文化建设提升行动,正努力将清水河县打造成为具有北疆文化深厚底蕴的文博大县、文旅强县、艺术名县和现代文明之县。



清水河博物馆暗红色墙体与周边台地浑然一体。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 【一言】

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本质上是文明密码的当代转译。后城咀石城遗址的考古发现,将内蒙古建城史前推至4000年前,这种时空坐标的重构,打破了“游牧文明无城郭”的刻板认知。老牛湾“长城入河”的地理奇观,实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的具体表达。这些文化地标的值,不在于简单陈列展示,而在于其承载的文明对话密码能为当代边疆治理、民族融合提供历史镜鉴。

解决文化发展困局,需要超越传统治理思维。清水河面临的资金、人才、认同三重困境,本质是文化治理体系与时代需求的结构性错位。其创新性的“政策包+生态链”模式,将国有存量资产转化为文化资本,用“技术入股”激活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创造力,这种制度设计跳出了“输血式”扶持的窠臼,构建起文化价值转化的市场通道。柔性人才引进机制与“文化人才编制池”的创设,既保持了体制的稳定性,又打破了人才流动的壁垒,这种“制度弹性”正是边疆地区破解人才困境的关键。

文化认同的建构,本质上是一场静悄悄的社会变革。清水河的“文化浸润计划”将非遗工坊研学纳入教育体系,看似是文化传承的技术性举措,实则是重塑代际文化记忆的系统工程。当青少年在拉坯制陶中触摸先民智慧,在布艺缝制间感受匠人精神,文化基因便获得了新的传承载体。“新乡贤文化”的复兴,则搭建起城乡文化反哺的桥梁,让离散的乡土精英重归文化共同体建设。这种浸润式、参与式的文化重塑,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具生命力。

站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坐标上,清水河的探索昭示着:文化从来不是发展的装饰品,而是深植于大地的发展原动力。当一座县城学会用文明演进的尺度丈量发展,用文化创新的钥匙打开未来,那些沉睡的遗址、尘封的技艺、古老的故事,都将化作滋养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这种文化自觉与发展自信的双向奔赴,或许正是边疆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密码所在。

# 文化资源富集地如何推动文旅融合

□王秀艳 李喜波



清水河段明长城墩台遗迹。  
本报记者 金泉 摄

## 底蕴厚重 文脉绵长

清水河县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

据统计,广布在清水河县境内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有578处,喇嘛湾镇白泥窑子遗址、宏河镇岔河口聚落遗址表明,从距今五六千年的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早期开始,这里就有了较为连续的人类生产生活痕迹,黄河滋养下的清水河地区是仰韶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出土的彩陶等文物印证了中原农耕文化

向北扩散的脉络。

位于宏河镇的后城咀石城遗址是内蒙古自治区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规模最大、防御最为严密的龙山时代石城。近年来,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多次发掘,出土了多种文化类型的陶器、玉石器、骨器等文物,并发现城内有高等级建筑群,实证在4000余年以前,清水河就开启了内蒙古地区建城史,是内蒙古地区文

明曙光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战国时期,今清水河县域属赵国版图,因地势险要,距中原较近,其后的2000余年成为中原王朝率先在北部边疆着力经营的地区,也是北方各游牧民族不断南下、融入中原文化圈的重要孔道。

清水河博物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元代青铜器万户府印,反映了蒙元时期的行政制度与民族治理。

老牛湾段明长城与黄河在此交汇,形成“长城入河”的壮景,见证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明朝晚期,随着蒙汉人民交往交流日益频繁,内蒙古南部地区农业得到初步开发,山西等地移民沿着偏头关等地大量迁入,今清水河县域内形成了诸多农耕村落,老牛湾古码头、骡驮轿婚礼等遗迹和民俗,体现了汉蒙融合的生活方式。

抗战时期,1937年10月,晋绥边区在清水河县北堡乡老牛坡村成立了蒙晋交界地区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为晋绥边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技艺传承方面,清水河现有踢鼓子秧歌、黑矾沟瓷艺、骡驮轿婚俗、清水河布艺4个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其中,骡驮轿婚俗是明末清初特有的娶亲形式,体现了清水河深受山西移民文化的影响。此外,石磨豆腐制作、米醋制作技艺、石窑洞建造技艺、民间唢呐吹奏等传统习俗也富有地方特色,也是人们今天了解清水河县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

## 直面问题 精准施策

通过调研了解,清水河县在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资金投入渠道单一,文化基础设施相对滞后与资源分配失衡,如县科技馆因场地面积不足,很多展品没有足够的场地进行展览;县图书馆、博物馆、文体中心集中于城关镇,清水河县所辖其余7个乡镇覆盖率不足。

二是人才断层与创新能力不足。专业人才流失严重,基层文化站专职人员中,40岁以上占比超65%,30岁以下青年人才流失率平均增长8%,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平均年龄达58岁以上;数字化运营、文创设计等新兴领域人才缺乏。

三是群众参与和社会认同需要加强,农村地区文化服务供需错配问题突出,农村老年留守群体参与率低;青少年对清水河竹编、古法制陶等本土非遗技艺认知度低,文化传承面临断裂风险。

结合清水河县实际,高质量实施北疆文化建设提升行动,要以“做实基础+政策杠杆+人才建设+文化认同+产业融合”为基本路径,实

现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双向提升,推动清水河县成为彰显黄河文化、民族团结和生态文明的文化高地。

一是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积极开展考古调查,摸清家底,以保护传承为载体,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传承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

二是通过政策杠杆撬动社会资本参与,跳出“给钱给地”的传统思路,转向“政策包+生态链”的系统设计,通过财税杠杆降低门槛、金融工具放大效能、产权改革释放价值,最终实现社会资本与公共文化的共生共赢。将国有旧厂房、富余校舍等划转为“文化功能用地”,吸引社会资本改造;探索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技术入股”模式,与企业形成股权合作等。

三是以“制度松绑+情感联结”着力构建“引育用留”全链条人才生态,创新激励机制打破体制内外壁垒,发挥人才在促进清水河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坚持柔性引进与在地化培育结合,对接高校、自治区级文化机构,以项目制引进非遗数字化、文旅策划等领域专家,

开展理论研究与历史挖掘,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创新激励机制打破体制内外壁垒,建立“文化人才编制池”,统筹部分事业编制,专用于文化领域紧缺人才,实行“岗编分离”,人才派驻企业期间保留编制与基础薪资。

四是文化认同重塑,激活内生动力。实施青少年文化浸润计划,中小学必修课嵌入“本土文化实践模块”,每年组织开展非遗工坊研学,计入学生成综合素质评价。开展新乡贤文化复兴行动,建立在外成功人士数据库,聘请乡贤担任清水河县“文化发展顾问”,其推荐投资项目享受相关优惠。

五是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精心打造以“老牛湾5A级景区—好汉山明长城—老牛坡古村旧址”为主的文化旅游区、以“文化遗址—文博场馆”为主的历史体验区,建设“宜居”县城。坚持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通过制度设计让文化产业反哺文化事业、文化事业滋养文化产业。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主体相结合,既守住历史文脉底线,又释放产业创新活力。

(作者王秀艳系内蒙古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喜波系内蒙古大学历史学博士)

## 【见证】

# 秀美柳条编出融合情

□本报记者 高瑞峰

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地处阴山北部,几千年来,武川地区一直是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交汇之处。

千百年来,武川地区先后生活着鲜卑、突厥、柔然、契丹、女真、蒙古等马背民族,由于当时缺少陶瓷烧制技术,耐摔碰、好携带的柳制品因此成了北方民族的常用之物。

辽金时,射柳十分盛行,元明清传承不衰,射柳成为当时端午节的祭天盛典,以此乞求苍天保柳盛畜旺,国昌民丰。

古书记载,北方游牧民族在皇家祭祀活动中举行的射柳比赛源于古鲜卑族秋祭时驰马绕柳枝三周的仪式。

熊梦祥在《析津志辑佚》中记载,元代过端午节时,“以柳条去青一尺,插入土中五寸,仍各以手帕系于柳上,自记其仪,有引马者先走,万户弓引随之,乃开弓射柳。断其白者,则击鼓为胜……”

明清时期,大批山西、陕西等“关内”人“走西口”来到“关外”内蒙古地区,其中部分“关内”人定居在武川地区。

他们的到来,不仅给武川地区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也带来了先进的柳编技艺。

红柳外观鲜红美秀、柔韧易曲,是阴山北部草原最为茂盛的灌木类植物,为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柳编材料,自古是制作套马杆、蒙古包龙骨、篱笆、围笆的上好材料。

当地老人说:“只要有柳,人们一天便能建起房院。”而年复一年收割的柳枝来年生出的细嫩柳条通体修长,根尾匀称,编织生活用具最为合适,乡间俗称“白露割柳,编筐篓”。

武川当地柳匠编织的柳制品多带皮,俗称黑货,粗犷实用。

黑货常见的编织方法是勒编,以麻绳为经、柳条为纬,麻绳相互交错穿过柳条之间,穿一次,绕扣勒紧,如此反复。民间通常所见的簸箕、柳斗、箩筐、柳包等均用这种方法编结主体部分,边缘部分常另外编板或者加框,固定主体边缘不致散落。

“关内”人编织柳制品去皮,俗称白货,看上去更为精美。他们在勒编的基础上,又添加了平编、绞编、砌编、缠边等多种编织方法,丰富了柳编工艺技法。

去皮后的柳条光洁顺滑,编织时以柳条为经,细麻绳为纬,麻绳嵌入柳条中环环相扣,柳制品的结构从而更为紧密。

用这种编法编织出的油篓、水斗、笸箩、簸箕等容器盛放液体不渗漏,为当时生活用具缺乏的北方地区带来了很大便利。

千百年来,经过几代柳匠的融合创新,现在武川地区手工编织的柳制品纹路平整、质地坚硬、极具韧性、经久耐用,外观粗而不俗、简而不陋,体现了多民族文化共融的特色。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和发展,时至今日,虽然簸箕、箩筐等柳制品依然是武川当地家家户户常见的用具,柳匠却已寥寥无几。

武川县文化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一件柳制品是否美观结实,全在于柳匠的手艺是否高超,目前,武川县仅有的几位柳匠均年事已高,基本不再从事这个行业,年轻人会编织的少之又少,传承发展迫在眉睫。



老牛湾晚景。本报记者 金泉 摄